

我的改革观

孙效良 著

人 民 出 版 社

自序

这本书记录了我对于中国体制改革的基本观点，故名《我的改革观》。

自1980年被卷入改革的浪潮，既从事实际工作，又从事理论研究，每年都遇到大量实际问题需要解决，并且要从理论的高度给予说明和回答。在这种客观形势的推动下，每年都有几篇论文发表。14年过去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体制改革都几经磨难，迂回曲折地向前发展，而且看来今后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路要走。我作为改革大潮中的一分子，觉得有必要把自己对于改革的认识过程和实际经历作一个回顾、反思、总结，于是就着手编辑了这本书。目的不仅在于总结自己，也在于为热心改革的同行和后来者提供一点借鉴，以便于在今后的探索过程中少走些弯路，少付出些代价。

从这一目的出发，全部论著都是按年代编排的。这样，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思想认识发展的脉络，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改革的实际进程。当然，认识的发展并没有终结，但可以看出，后来的认识比从前的认识确实是在不断地深化。

为了方便读者，在每篇论文之前都加了一个提要，说明每篇论文观点的新鲜之处，不管是对的还是错的。

在我的全部论著中，有四点特别值得敬告读者：其一，在改革的各派论点中，我是属于“配套改革关键论”中的一员，其代表作就是《经济体制改革系统论》。其二，在企业体制改革的几派论点中，我是热心倡导股份制的，不仅参与了理论研究，而且参与起草了许

多关于股份制的法规文件，其中包括企业到境外上市的法规文件。1993年还受命组织了中华企业股份制咨询公司，把一批批企业送上了境内外股票市场。其三，为了在中国发展企业集团，曾经作了大量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特别致力于把世界惯例中国化，使之便于在我国生根、发芽、成长。其四，政策科学尽管不属于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但它确实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而被提到议事日程的一门学科。我是在中国建立政策科学的一名积极分子，并较早地出版了这方面的专著——《政策研究学概论》。只是由于篇幅关系，这里未收入全部，只收入一篇《研究产业政策的若干方法论问题》。一个人的一生总应当留下点痕迹，以上四点就算是我留下的一点痕迹吧！

中国正在世界上崛起，其推动力就是体制改革。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中国定将在改革不断深化的推动下，跻身于世界强盛国家之林。

孙效良

1994年10月

目 录

自序.....	1
1980年	
推动力、主动权、市场经济.....	1
——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主要方面	
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讨论中的不同论点.....	9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	11
1981年	
如何实现宏观经济决策科学化.....	21
思想工作是一门科学.....	28
1984年	
关于计划体制改革的几个问题.....	50
充分发挥城市的经济中心作用.....	60
1985年	
国家经济计划改革断想.....	77
“官本位制”及其他.....	84
发展专业化生产的路子应当怎么走？.....	89
经济效益系数的基本原理和实际应用.....	97
1986年	
关于运用经济杠杆的若干问题.....	110
论发挥优势.....	121

研究产业政策的若干方法论问题.....	125
政府在发展企业横向联合中的作用.....	131
行业管理的几个问题.....	135
1987年	
经济改革面临的四项抉择.....	145
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职能及其改革.....	151
1988年	
承包十忌.....	174
关于企业兼并的几个问题.....	181
1989年	
承包制面临的挑战与对策.....	200
机电工业结构调整方略.....	206
1990年	
美国职工持股计划评介.....	217
经济体制改革系统论.....	228
附：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在哪里？.....	249
企业体制改革走向的比较研究.....	250
论经济决策结构.....	259
——集权与分权的辩证统一	
1991年	
国有企业经营方式改革初探.....	268
1992年	
我国股份制研究中的若干理论和认识问题.....	277
我国股份制实践中的若干操作和方法问题.....	291
发展企业集团的若干理论和方针政策问题.....	307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构想.....	329
1993年	

关于国有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研究报告.....	345
股灾和股灾的防治.....	368
1994年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四要素.....	375
论法人企业制度.....	396
从国营企业到上市公司.....	408

1980年

推动力、主动权、市场经济

——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主要方面

提要：本文最初刊载于1979年3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后来作为1979年8月召开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讨论会”的论文，最后发表于1980年《经济管理》第三期。文中明确提出了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改革“大锅饭、铁饭碗”的分配体制，并初步形成了配套改革的思路，是当时理论界一派观点的代表。同时，还较早地提出了市场经济存在的客观必然性，但对于市场经济内涵的阐述，是到1994年才完成的。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问题，已经有了许多比较系统的意见，涉及到的问题基本上都提到了。但有这样三个问题，似乎还需要进一步探讨，以便求得统一认识：一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什么，二是几个方面改革的互相关系，三是改革可能引起的问题及其对策。这些问题搞清楚了，才能抓住要害，提纲挈领，解决问题。

中心问题是改革分配制度

现行管理体制的弊病，尽可列出十条、八条，但百病的渊藪是“捧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的分配制度，企业的经营成果与劳动者

个人的经济利益分割开来，不能充分调动内在的动力，事事都要靠外部的力量去推动。因此，中心问题是要改革分配制度，解决内在推动力的问题。

规律性的东西是对大量具体事实抽象、概括的结果。为了说明上述观点，需要具体分析一下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几个“老大难”问题。

投入生产的资金不能充分发挥效益，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基本建设周期长，流动资金占用多，周转慢。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投资作用发挥得好不好与个人的经济利益不挂钩。基建投资和流动资金都由国家无偿拨款，全体职工的工资和奖金，既不因投资效果发挥得好而多拿，也不因投资效果发挥不好而少得。这种体制，必然造成“三怕、三不怕”：只怕要不到投资，不怕投资效益不好；只怕要到的投资少，不怕资金浪费大；只怕分不到设备，不怕设备利用率不高。这当然是思想问题。但是，存在决定意识，不改革这种体制，这种思想就很难避免。

新产品发展慢，是另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拿机械产品来说，工业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家为了竞争，攫取高额利润，近十多年来多数产品已经换了两、三代，而我国却是20多年如一日，改进很少。为什么造成这种状况？有一个冷冻机厂的例子很能说明问题。这个厂生产的活塞式冷冻机，是仿苏40年代的产品。该厂技术人员设计了一种新型的离心式冷冻机，据计算效率比活塞式冷冻机可提高10%。但是，厂里有的领导同志却认为：生产老产品，质量过关，工艺成熟，年年完成计划，不必搞新产品自找麻烦；再加上没有列入新产品试制计划，配套用的电机等不能解决，只好不了了之。

从这里看出什么问题呢？我们的产品是实行统配包销体制，

只要是按国家计划生产的，哪怕再落后，也不愁没销路。因此，对企业和个人来说，发展新产品没什么好处，不发展新产品也没什么坏处，因而缺乏发展新产品的内在推动力；就是企业想发展新产品，如果没有列入新产品试制计划，资金、材料、配套统统无法解决，想搞也搞不成，企业没有发展新产品的主动权。

服务质量不好，是国内外反映强烈的一个突出问题。从商店售货员的服务态度，到机械设备的维修服务、配件供应，直到根据用户需要发展新的品种，都有不少问题。为什么？有人把这归结为没有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这当然是对的，但还没有抓到问题的根子。《林家铺子》里的林老板，难道比我们的售货员为人民服务的思想树立得更好吗？显然不是。那末，他为什么为了卖一顶帽子，对一位衣衫褴褛的农民服务态度那样好呢？无非是为了多销售商品，多赚一点钱。而我们商店销售额的多少与个人的经济利益却毫不相干。这就难怪“提高服务质量”的大字标语到处可见，而服务态度改进却不甚显著。

还有，欧美国家的化肥厂，普遍替用户化验土壤。根据土壤的特点，生产各种复合肥料，满足用户需要。而我们的化肥厂没有一个这样做的。这又是为什么？因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化肥厂不这样做就会失去主顾，丢掉市场，赚不到利润。而我们，不管盈利、亏损，大家工资照拿，只要完成“八项指标”，就是呱呱叫的好企业，根本没有什么推动力促使他们去做替用户化验土壤之类的服务工作。

瞎指挥也是我们经济活动中的一种“常见病”、“多发病”。诸如“菜农不吃亏心粮”之类的口号，机电产品强调“地区自配率”之类的政策，脱离实际的建设计划，等等，都曾给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重大损失。大量企业因为确定基本建设项目时的瞎指挥，造成前后左右不配套，资源、销路没保证，建成投产之日，就是

亏损开始之时。

1958年就曾批判过瞎指挥，近来又批判违反客观规律的“长官意志”，为什么总不能杜绝？有人归结为官僚主义。这当然也是对的。但根本原因还在于事业的成败与个人经济利益没有直接联系。一个错误的决定，一项失算的计划，可以给国家造成亿万元的损失，而决策者个人的经济利益却可以丝毫不受影响。这个问题不解决，官僚主义是杜绝不了的。

我们的经济活动中的弊病不止上述这些。但百病同源，主要原因是没有把事业经营的好坏与个人的经济利益联系起来。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正确解决内在的推动力。

我们搞社会主义建设，要靠政治挂帅，提倡不为名、不为利，为革命多做贡献；提倡每句话，每个行动都要对人民负责。没有这个政治的动力是不行的，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同时，实践也向我们证明，只靠政治动力，对先进人物是可以的，对全体公民却是不够的；短期内是可以的，时间长了是不行的。列宁早就指出：“必须把国民经济的一切大部门建立在个人利益的关心上面。共同讨论、专人负责。由于不会实行这个原则，我们每一步都吃到苦头。”列宁还为这一段文字加了一个简单明确的标题，叫做“个人利益的原则”。

必须说明，承认要从个人经济利益上关心企业的经营成果这个原则，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削弱思想政治工作。只是强调两者互相结合，才能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的老传统。今天，在动员全国人民向四个现代化进军的时候，有什么理由不把政治动力和经济动力结合起来？我的结论是：政治动力加经济动力就将有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发展速度。

三个方面的改革相互联系，要“同步”进行

不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已经明确了必须把事业经营得好坏与个人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具体地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体现了国家利益、企业利益与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

当然，光是原则还不够，还必须找到一个实现原则的具体形式。可以考虑分两步进行改革：第一步，先把奖金与利润挂起钩来。把现在按工资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奖金，改为按利润总额的一定比例提取奖金，利润多奖金多，利润少奖金少，无利没有奖金。第二步，实行更彻底的改革，把企业经营好坏与工资挂起钩来。工资分成两个部分：一部分固定工资，打入成本；一部分活动工资，从利润中提取，利多工资高，利少工资低。这样做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各种产品利润率悬殊很大，盈利多少并不能完全反映企业经营好坏。因此，作为一个准备步骤，需要对价格、税收加以全面调整。

实行这种办法，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必须改变现在这种财政统收统支、物资统配包销、计划大包大揽的管理体制，给企业以更大的主动权。道理很清楚，在目前这种管理体制下，经营好坏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由企业本身决定的，而是由上级管理机关决定的。因此，不能让企业职工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经济后果。

财政统收统支，要改为企业自负盈亏。企业利润不再全部上交，而只以税收形式上交一部分，其余留企业自行支配。可以用于技术改造，改建扩建，也可以用于发展新产品，还可以用于集体福

利事业或奖金。如何使用，由企业决定，上级机关不要干涉。这样，国家拿到的利润虽然少了，但企业需要的资金一般均由企业自行解决，国家的支出也少了。这不仅可以使国家掌握的资金集中用于重点项目，也可以使企业真正有独立经营的自主权。

资金要在生产中发挥作用，必须有物资保证。实行企业自负盈亏后，物资管理也要改变目前这种统配包销的体制。少数物资由国家安排生产计划，继续实行统配包销；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大多数物资，应当由企业通过市场购买。有买就要有卖，与此相适应，要允许企业生产的产品，通过市场自行销售。

这样，就打破了现行的计划管理体制。要把国家下达的包罗万象的指令性计划，改变为国家只对少数产品生产下达指令性计划，而大部分产品的生产由企业自订计划，通过市场进行交换。这就是说，要允许有一个包括生产资料在内的市场经济存在。当然，对这部分市场经济，也不能放任自流，要有一套相应的法令、政策和办法加以调节和管理，使之纳入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的轨道。

以上概括起来是三个方面的改革：一是改革“大锅饭”的分配体制，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使我们的经济发展获得更大的内在推动力；二是改革财政统收统支、物资统配包销的体制，给企业以独立经营的主动权；三是改革由国家下达指令性计划的体制，允许市场经济存在。这三种改革互相联系，缺一不可，但中心问题是分配制度的改革。现在人们往往只注意了扩大企业权限和利用市场机制，殊不知，不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只孤立地扩大企业权限，也很难保证发挥积极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更多的瞎指挥。可以说，扩大企业权限是把企业经营好坏与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前提条件，而这种“联系”，又是使扩大企业权限发挥积极作用的保证。市场经济则是扩

大企业权限的必然结果。不扩大企业权限，完全按国家计划生产，物资由国家统配调拨，市场经济既没有存在的必要，也没有存在的可能。总之，这三种改革尽管有主有次，但必须“同步”进行。孤立抓哪一个方面，都可能引起不良的后果。

到此为止，还只是谈到了企业如何把经营好坏与个人经济利益联系起来的问题。如何把各级经济管理部门工作成果与个人经济利益直接联系起来，也必须研究解决。这可以从两方面考虑改革办法：一方面要“脱钩”，作为政府部门的行政管理机关，不要去干预企业的日常经营活动；另一方面，要“挂钩”，要建立经济决策的责任制，谁决策，谁对其执行的经济后果负完全责任，把权力和责任挂起钩来。

改革可能引起的问题及其对策

照这样改革，特别是允许市场经济存在，会不会导致资本主义？不会的。从根本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两种不同的市场经济。在这里产品交换的双方，不是资本家，而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单位；市场活动也不是盲目自流，而是由国家通过经济政策和经济手段加以调控。实际上，现在普遍存在的所谓“以物易物”，就是市场经济的性质，只不过还不承认它的合法性罢了。

照这样改革，是否会破坏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过去我们是把国家机关下达指令性计划作为保证按比例发展的唯一手段，但实践效果并不好。

允许市场经济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由过去用一种方法改为用两种方法调节我们的经济活动：国家仍然要有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但内容和作用方式却应与过去和现在有所不同；同时，也要利

用市场机制。这样做的结果，只会更有利于资源配置，更有利于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计划主要是围绕156个重点项目安排的。其他经济活动，主要是通过市场进行，国家用经济政策加以控制调节。当时各方面的比例关系并未因此而遭到破坏，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这个历史的经验，对于今天我们研究市场经济仍有重要意义。

照这样改革，会不会扩大分配上的差别？可以预计，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经营好的企业比经营差的企业职工工资要高。但正是这种高低差别，才能产生一种改善经营管理的动力，促进国民经济发展，从而更好地满足劳动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如果不要这种差别，那就只能是企业经营好坏一个样，就会影响国民经济高速度发展，也会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因此，我们一方面既要采取措施，不要造成两极分化。比如，应给经济落后地区以重点补助，缩小它们同经济发达地区的差距，要保证经营不善企业的职工收入，能够维持一定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承认差别，不要怕有些企业的职工先富起来。大家都是“端着铁饭碗”，但铁饭碗里面的东西，数量和质量都应当是有差别的。

照这样改革，还可能出现物价浮动、劳动力流动、甚至一部分企业不能维持下去，带来就业问题等。因此，在实行改革时要逐步推开，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时研究出妥善解决的办法，使经济体制改革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附：

经济管理体制改革讨论 中的不同论点

（摘自1979年9月21日人民日报）

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物资经济研究所和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在哈尔滨联合召开了经济核算和经济改革理论讨论会。现将讨论中关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的不同论点简介如下。

一种看法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改革分配制度，其核心就是改革财政管理体制。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说，分析一下我国经济活动中的几种“常见病”、“多发病”，可以发现，百病的渊藪，全在于“端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企业经营好坏与企业及其职工的物质利益没有关系。这种分配制度，如果不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足够的推动力。而分配制度主要体现在财政体制上，所以改革的核心，应当是财政管理体制。必须使企业有一定的自主财权，并使企业经营的好坏与企业及其职工的物质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真正体现按劳分配原则，体现国家、企业、职工三者利益兼顾的原则。

另一种看法是，经济改革的中心问题是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其核心是解决综合平衡问题。持这种观点的同志说，回顾我国国民经济的几次大起大落，除其他原因外，也有指导思想上的问题。尤其是综合平衡没有搞好，计划不仅不留余地，反而缺口很大，计划

成了“半计划”甚至“无计划”，生产处于半无政府状态，国民经济计划比例严重失调。所以，一定要从改革计划管理体制入手，抓住综合平衡这个根本问题做文章，以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高速度发展。

再一种看法是，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中心问题是调整好生产关系，其核心是要解决所有制问题。持这种看法的同志说，全民所有制与集体所有制都是社会主义公有制，采取什么形式较为适当，要看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企业实行自负盈亏，财务自理，实际是大集体所有制，这是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是权、责、物质利益结合得最好的形式。把所有制调整到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有好处，这不是所有制的倒退。有的同志对此持反对意见，认为现在需要调整的是全民所有制的内部关系，而不是所有制本身。决不能授予国营企业以集体企业那样大的独立自主权，以免出现权越大，盲目性也越大，从而冲击国家计划的现象。

对于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先改什么，后改什么，也有不同看法。有的同志主张，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应当先行一步，因为财政对经济有反作用，从这里打开突破口，暴露各方面的矛盾，加以解决，能够推进和协调各方面的改革。有的同志持反对意见，认为这违背了“经济决定财政”的基本原则。财政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为前提，并要与之相适应，以免将来经济管理体制变化，财政管理体制又要跟着变化。有的同志认为，目前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眉目还不很清楚，在这种情况下，财政管理体制小改小革先行一步倒还可以，大改大革则不适宜。

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竞争

提要： 本文曾分别发表于《人民日报》理论版和《财贸经济研究》。文中比较系统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产生竞争的内因、从因和辅助条件，肯定了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需要竞争。

竞争，向来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经济特有的现象，但它却出现在我国的经济生活中。这便提出了一系列的问题：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竞争？竞争对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有什么作用，会带来些什么问题？如何趋利避害，使竞争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这些都必须给予明确的回答。

（一）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会出现竞争

为了便于说明这个问题，要从竞争在我国是怎样发生的谈起。从实际情况来看，主要是三个因素促成了竞争的出现：一是实行市场调节，利用市场机制；二是通过利润留成等方式，开始把企业经营成果与职工经济利益挂起钩来；三是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任务不足，出现了供大于求的情况。事情就是这样：由于国家下达的计划任务不足，并且完成任务多少与职工切身利益发生了联系，就促使企业竞相承揽任务；实行市场调节则给了企业自行承揽任务的权力。正是在这三重作用下，促使企业之间比质、比价、比品种、比服务，以争取产品销售市场。这就是竞争。虽然还是不充分的竞争，但已经具有了竞争的基本特点。

从这里可以看出：各经济单位独立的经济利益，是产生竞争